

那些香港朋友所教導我的事情

何明修*



我在 2019 年初出版了一本比較臺灣與香港占領運動的學術專書，*Challenging Beijing's Mandate of Heaven: Taiwan's Sunflower Movement and Hong Kong's Umbrella Movement*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探討與比較了 2014 年臺灣太陽花運動與香港雨傘運動的起源、過程與後果。臺灣的運動反對與中國簽訂的自由貿易協議；香港的運動則是爭取政治民主的運動，要求特首選舉採取真正的普選；兩件受關注的社會運動構成絕佳的成對比較 (paired comparison)。在臺灣與香港，反對黨與社會運動組織都扮演了協助者角色，但是運動領導權卻仍主要是由學生所掌握。儘管兩場運動起源於不同的議題（貿易自由化與普選

*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主任

權)，運動背後都有相近的經濟不滿、本土認同浮現、青年世代的相對剝奪感。

在該書出版不久，香港政府以一樁發生在臺北的殺人命案為由，強力推動逃犯條例之修訂，「被送中」的恐懼催生了一場更為強大的反抗運動。到後來，送中條例雖然被撤回，但是爭取民主與自由的香港人卻付出巨大的代價。中國政府片面推行的港版國安法，等於正式終結了之前承諾五十年不變的一國兩制。在目前，香港立法會沒有一位反對黨議員，民主派領導者不是身陷囹圄，就是流亡海外，更多被捕與被判刑的前線手足。一座七百多萬人的城市，一年來的抗爭帶來超過上萬人次的拘捕；如果這不是國家暴力，那麼什麼才是國家暴力？

對於迅速轉變的政治局勢，學術研究者無法參與其中，往往只是扮演一位消極被動的旁觀者，而且深刻了解，自己觀察所獲致的結論永遠只是暫時性，恐怕無助於爭取民主與自由的行動。在雨傘運動落幕之後，香港興起一股青年參政的風潮，香港眾志、本土民主前線、青年新政等團體的崛起曾帶來新希望，結果沒有幾年，這些團體紛紛被迫解散，主事者被捕或是被迫流亡。德國哲學家黑格爾曾說，人類從歷史中學到的唯一教訓，就是人類無法從歷史中學到任何教訓。黑格爾的感嘆是針對人類的短視與無知，尤其是針對那些曾經掌控大權的政治領袖，因為他們往往犯下了不應出現的致命錯誤。當權者缺乏自知之明，這或許不令人意外：事實上，研究者也同樣容易犯錯，再怎麼扎實的研究資料蒐集，也是有可能導致失準的誤判。

從過往的經驗來看，學術研究者或應該要更為謙虛，需要更坦率承認自己認知的不足。黑格爾認為，驅動歷史邁進的力量來自於「狡猾的理性」，其利用人類的野心與欲望，來促成理性實現的歷史目標。但是對於處於後啟蒙時代的我們，尤其是歷經了上個世紀各種人為災難，包括猶太大屠殺、蘇聯農業集體化、中國的大躍進與文化大革命、紅色高棉大屠殺，真的還有人相信這些巨大而無意義的犧牲是為了某個歷史進程之目的嗎？

眼下的香港是一座巨大的牢籠，逃亡、流亡、離散已經成為這座全球城市的心情寫照。早在全球化一詞被發明之前，香港就是高度國際化的港埠，曾接納了不見容於清帝國、共產中國與臺灣戒嚴體制的異議人士，也是華人社會中唯一享有出版與言論自由的地區；卻沒有料想到，香港出現了本土的政治犯與政治難民，政治氛圍也迅速朝向中國內地化的方向邁進。很多人試圖用臺灣過往的歷史來理解當前的香港，目前殺氣騰騰的國安法體制的確與臺灣五〇年代的白色恐怖有點類似，對於反對派領袖的大肆拘捕也像是美麗島事件。很顯然，2021年的香港不會是1950年或是1979年的臺灣，這些類比有明顯落差。

香港的下一步會怎麼走，沒有人能說得定，學術研究者能夠做的即是劇變局勢下，記錄不同參與者的想法與努力，並且精煉與概念化這些珍貴經驗，形成更具有普遍性的理論命題。

我是先有機緣結交香港的朋友，後來才認識他們追求民主的運動，也是基於先前的認識，我才對於他們的志業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在 2011 年，香港因為本土派興起，運動陣營內部產生激烈的論辯，我還記得是在深夜的中環大排檔，一位學界朋友在衛生紙上用大中華／本土、左／右兩條政治光譜，標誌出香港反對運動的空間分布。臺灣人熟悉既有獨統之爭，但是卻很難想過往被認為是務實、去政治化的香港人卻為了意識型態立場而激烈爭辯，明明他們的共同敵人都是共產黨。

在 2014 年臺灣太陽花運動期間，我恰好訪問香港，也在大學講述了臺灣社會運動的歷史。在會後，一位占中運動的領袖私下表示，香港不可能發生占領運動，因為香港人沒有歷經過臺灣的二二八，也沒有臺灣人的悲情。沒有想到，半年後雨傘運動卻持續長達 79 天，遠超過太陽花運動的 24 天。

在 2016 年的魚蛋革命之後，香港民主運動陷入長期的低迷，我認識的年輕運動者都很悲觀，看不到運動未來的前景，反對陣營也深陷嚴重的分裂。出乎意料，送中條例迅速弭平縫合了原先的分歧，香港人發起了前所未有的抗爭行動，就動員規模、激進化程度、持續時間，都超越了 1925-1926 年的省港大罷工、六七暴動。在反送中運動逐漸喪失了街頭抗議動能之後，有些受訪者非常熱心地幫我邀約其他參與者，他們希望這些運動參與的點滴故事得以永久記錄下來。我還記得一位受訪者堅定告訴我，他拒絕離開香港，因為很多手足已經被判刑入牢。「如果我們都移民了，等到他們出獄，誰要來迎接他們？那時的香港還是原來的香港？」我聽完之後，感到一陣鼻酸，也覺得自己的學術書寫工作更加沉重。

我的香港朋友執著於各自的政治理念，經常誤判局勢，甚至完全不顧及自己的身家安全。他們所教導我許多道理，其中之一即是人類信念是一股消耗不盡的再生能源，追求民主與自決的渴望不見得每次都能成功，但是它始終是挑戰專制獨裁最強韌的武器。